

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对象、逻辑与路径*

田野 毛延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必要举措。首先,就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对象来讲,中华文化是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根基,有助于中国话语兼具“文以化里”与“文以化外”的时代价值,以中国话语彰显中华文化基因与文化力量;其次,就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逻辑来看,以文化合理性、文化合适性与文化有效性塑造中国话语的底层逻辑,有助于拓展中国话语的“内涵”与“外延”,科学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使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领域的竞争中具有优势,从而彰显国际影响力;最后,就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路径而言,文化指示、文化预设与文化行为有助于中国话语实现“话里”与“话外”的整体建构,最终实现“以言成事”,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而在国际社会发出颇具分量的声音。总体而言,文化语用视角介入中国话语建构,不仅有助于将中国的理论优势、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转化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优势,以此加快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能更好地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韧有力的话语支撑。

[关键词]文化语用学 中国话语 文化叙事 对象 逻辑 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 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3-0005-11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质量与规模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仍存在发声不足、表达不够、阐释不强的话语困境,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靠“他塑”而非“自塑”。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尚未形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面对国与国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如何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建构起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直面

的重要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P46)}。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话语建构不仅有助于直面国际话语斗争,破除西方话语神话,树立文化自信,还能以此为契机提出更为有利的话语策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地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

因此,这需要语言学者积极寻找并创造“含生气”“蕴底气”“接地气”的中国话语,

收稿日期:2025-09-04;修回日期:2026-01-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标识性话语海外译介的百年嬗变研究”(21YJCZH247)

作者简介:田野,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语用学与国际传播研究;毛延生,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语用学与媒介话语研究。

不断为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量赋能,同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语言文化维度的力量。

目前,学界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但中国话语在国际语境下的可对话性、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仍有缺失。^{[2](P37)}究其缘由,是中国话语乃至对外话语体系在建构过程中未能找到中华文化迎合国际受众的“切入点”“连接线”与“融合面”,中华文化的底蕴与价值未能彰显,导致中国话语的吸引力、阐释力与影响力不足,难以引发国际受众的“共情”与“共鸣”。有鉴于此,我们发现造成这一现状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对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关注不足,未能厘清中国话语及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中国话语的话语张力难以延展,在国际环境中面临西方话语范式牵制,受到西方话语束缚。可见,在文化语用学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具体表现为文化语用实践的对象、逻辑与路径)成为必要之举。聚焦文化语用学这一理论,它以话语为主要的解释对象,通过文化语境的介入、解释话语构成单位所携带的文化信息、话语整体受文化语境作用而体现的说者用意、情境期待、言语行为的文化转型,以及话语因此而产生的基于情境却又高于情境的文化功能。^{[3](P1)}从中可知,文化语用学致力于解释话语之中或背后的文化信息,目的是要还原话语本身所携带的文化语境或彰显其文化使命。可以看到,这一理论与跨文化传播学强调多种文化间的差异比较与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互动具有显著差别。因此,文化语用实践就是“将文化语用学理论应用于话语表达,聚焦文化语境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联性,结合话语产生和理解过程中的文化语境因素,言语交际中的文化准则和策略,以及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问题等优化语言应用”^{[4](P539)}。只有在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厘清文化语用实践的真实对象,才能确定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逻辑理路,为后续充分拓展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路径提供客观参照。

总体而言,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不仅有助于中国话语在国际语境的“增量”与“扩容”,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还能利用自身与文化元素和文化机制的密切关联,更加充分地展现客观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一、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对象

所谓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对象,是指在嵌入世界格局与中国发展的“泛语境”下,中国话语彰显出的中华文化基因与文化力量。这种文化语用对象不但要立足于文以“化里”,还要致力于文以“化外”,是中国话语可以践行的文化根基。“对象”一词的使用,不仅指出中国话语建构需要接受文化语用框架的规约,也表明中国话语建构需要顺应中华文化机理。站在“古今中外”这一历史交汇点上,中国话语建构应源自于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伟大革命文化、承继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也是顺应中国话语建构之“道”。

(一)活水与源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话语建构之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语用对象,中国话语的建构根植于其中,并彰显中华文化的功能性力量。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话语形成、发轫的文化之本。相应地,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对象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至真之理、至性之情、至效之力。

中国话语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真之理的文化语用表达。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合理念包罗万象,蕴含丰富的宇宙观、国际观、社会观与道德观,不仅贯穿中华文化发展的始终,也是中华民族躬行践履的文化理念。从倡导“君子和而不同”的人际关系,到“内治修,然后远人服”的国际关系,再到“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合理念”以其晓之以理的文化语用表达总括各类关系管理。中华民族将“和合理念”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形成中华民族骨子里爱好和平的基因,旨在个体与群体层面实现从客观世界的认识到主观世界的认同,而这正是中国话语张力延展的最终指向。

中国话语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性之情的文化语用明示。义利观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坚守和传承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原则,形成并发轫于古代的义利之辨。贵义轻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义利并重等主张均可视为传统义利之辨的典型表征。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倡“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无不表现出中华义利观蕴含的内生动力。中国在统一辩证的义利观思想指导下采取实际行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性情哲学理念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思想弹性,最终落实于动之以情的中国话语之上,实现从认知世界的理性到情感世界的共鸣,这正是助力中国话语激活文化自信,避免自负或者自迷的涉身体验基础。

中国话语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效之力的文化语用言说。中华民族自古就秉持独具民族标识的天下情怀。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纲要,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使命,都以成之以事的文化语用言说折射出中华民族厚重的天下情怀。中国话语建构所借助的文化力量正是基于自身文化使命而现身全球治理的一种情怀和努力。如果说外国学者的认识——“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的话,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5](P19)},反映的是他者视角下中华文化的现实意义,那么我们更应清楚这一文化样态既是增强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同人于宗”的抓手,更是提高外在影响力的“同人于野”的理据。当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中国话语的文化语用言说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前者提供历时溯源的起点,也为后者奠定话语选择、协商与适应的参照,这就为中国话语赋予充分的可理解性和可解释性,使之更具鲜明的文化意涵。

(二)承前与启后:伟大革命文化是中国话语建构之基

伟大革命文化作为文化语用对象,中国话语的建构聚合于此,并彰显中华文化的实践性价值。伟大革命文化孕育了卓越的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主动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形态变革而生成发展的”^{[6](P123)}。相应地,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对象指向伟大革命文化的鼎新之实、承新之志、至新之勇。

中国话语是彰显伟大革命文化鼎新之实的文化语用表达。“革故鼎新”是伟大革命文化的精髓所在,革命文化亦是在革故鼎新的历程中渐趋成熟,并构成支撑中国话语建构的辩证逻辑。具体而言,伟大革命文化的“革故鼎新”体现于革命理论在文化语用实践中的“去伪存真”。“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P70)}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高度凝练的文化语用实践阐明革命理论的至新之实。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到“三大法宝”理论,这些高度具象化的语用表达融入革命实践,规范和引导革命方向,成为在时代变革中照亮中国革命前途的磅礴力量。

中国话语是彰显伟大革命文化承新之志的文化语用明示。革命精神不仅是支撑革命运动最终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也是革命文化得以赓续绵延的红色血脉。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卓绝斗争塑造的伟大革命精神——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等,不仅是传承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标杆,也成为借助红色标识性话语以文化人实现情感明示的源点所在。中国共产党在饱经磨难的革命历程中怀揣革命精神与革命情怀,以豪情壮志的革命话语明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生生不息,构成中国话语在时空转场中贯通聚合的内驱之力。

中国话语是彰显伟大革命文化至新之勇的文化语用言说。纵观中华文化体系,革命文化起

到承前启后的时代作用,不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变革基因,也承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精神。从“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罢了”的文化语用言说折射出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变革精神,到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高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变革大旗,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喊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口号,在以言行事之间传递至新之勇,扭转战时困境,重拾文化自信。此间,伟大革命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也规约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话语标识,涉及国家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在语用实践中昭示革命文化的变革基因,构成中国话语横贯中华文化体系而发挥效力的现实写照。

(三)固本与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话语建构之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文化语用对象,中国话语的建构深化于此,并彰显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价值。这一文化样态是“先进性、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有机统一”^{[8](P10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内涵不仅可以融入中国话语建构之中,也构成中国话语崛起的不竭文化动能。相应地,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对象指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至深之蕴、至兴之魂、至真之值。

中国话语是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深之蕴的文化语用表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调人的身心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爱”^{[9](P10)},拥有久经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检验的深厚根基。此间,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至深之蕴正是中国话语建构的使命与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用表达,以底蕴之深、真理之坚的话语彰显规律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看作中国话语在时代关照下的文化价值延伸。

中国话语是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兴之魂的文化语用明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气魄与神韵集中展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两大精神血脉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10](P40)}。中国共产党将其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到“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再到“奥运精神”“抗疫精神”,均是伟大精神运用于伟大实践的文化语用明示,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与文化品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至兴之魂内蕴于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这既是中华文化赓续绵延的价值旨归,也是中国话语在时代变迁下坚守文化内核的精神保证。

中国话语是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真之值的文化语用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举国上下的价值追求,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以高度凝练的二十四字真言,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循序展开,形塑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大道至简的语用言说生成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与影响力,在文化语用实践中为中国话语集聚能量,最大限度地获得价值引领优势。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决定其不仅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理念正是基于文化元素开展文化语用实践来解决世界各国人民关心的普遍问题,不仅可以展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优势,也是检验中国话语在言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真之值时将文化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试金石”。

二、从内涵到外延: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逻辑

文化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和解释话语所携带的文化语用信息及文化语境功能的语用学学科。^{[3](P1)}文化语用逻辑则是为中国话语建构提

供立足点与生长点的有力佐证,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话语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陈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的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11]中国话语只有准确回答上述问题,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显示出影响力,而中国话语建构在文化维度的语用逻辑诠释可视作解答“四问”的底层逻辑原点。中华文化只有强大起来,文化语用实践的合理性才能彰显,中国话语才能准确解答“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中华文化只有自信起来,文化语用实践的合适性才能显现,中国话语才能深刻解答“人民之问”;中华文化只有发展起来,文化语用实践的有效性才能激活,中国话语才能客观解答“时代之问”。

(一)必然之维:文化合理性是中国话语建构的语用出场逻辑

就文化语境的视域而言,话语生产要求语言使用者遵守其所归属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内部所优选的语用理性设定及其背后的多层文化语用信息。^{[3](P1)}换言之,中国话语建构如若符合中华文化理性设定、遵循中华文化默认规则,就具备文化合理性。作为一种思想符号,中国话语不仅要拥有工具性价值,也应反映出蕴含于话语背后的文化价值。文化合理性则可引导中国人意识到“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12](P10)}。可见,中国话语建构成为中国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话语维度上必不可少的顶层设计,文化合理性则是中国话语建构的语用出场逻辑。

一方面,立足于本土化视角,中国之问是当代中国在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的问题而提出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13]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变革不仅包含深刻的中华文化传承与革新,也兼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文化初次结合创造了富有时代特色和民族气质的伟大革命文化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坚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矢志不渝地聚力解决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话语应以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高度文化自信发出中国强音。

另一方面,立足于全球化视角,世界之问是当代世界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1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样的世界之问,是身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语用逻辑追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立足全球视野,遵循中华文化的合理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理念来回应世界关切,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化的时代产物。中国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向世界传递原创话语,将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力量贡献给世界,在世界各国人民关注中国方案、聆听中国声音的过程中影响世界。总而言之,中国话语崛起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的强大,中国话语崛起也肇始于中华文化的强大。今日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可以展现大国文化思维,彰显中国气派,在交流互鉴、美美与共之中实现中国梦。

(二)实然之维:文化合适性是中国话语建构的语用现实逻辑

从语用选择的视域来看,文化合适性是以文化合理性为前提条件所开展的积极调适与动态升级。^[14]具言之,中国话语在文化合理性的前提下建构必然面临优劣各异的选项,需要在中华文化语境下选择最佳话语选项,规避话语误区,体现中国话语内涵与中华文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5]因此,中国话语的建构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科学回答“人民之问”,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忧人民之所忧。可见,文化语用视角可以规约中国话语的建构方向,文化合适性则是中国话语建构的语用现实逻辑。

立足于人民性视角,人民之问就是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要新要求,这给党的理论创新、治国理政提出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13]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话语解释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本思想不断激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进行创造性转化,“即由‘治民’的‘民本’转化为‘为民’的‘民本’”^{[15](P71)}。中国共产党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倾听人民心声,并以积极的话语回应人民现实需要作为解答“人民之问”的关键。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深刻把握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下的文化语境特点,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在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再到“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标识,正是解答“人民之问”的高度凝练与有效概括,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放眼国际,中国话语在解答“人民之问”过程中不仅可以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供现实指南,也为实现世界人民的解放提供了有效的文化语用实践范式。

(三) 应然之维:文化有效性是中国话语建构的语用实践逻辑

就文化语用的视域来讲,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有效性一方面表明话语信息及其背后的文化意图能够及时接受和充分理解,另一方面也表明受众在接受、理解信息后的一系列反应(包括情感、言语、行为等)符合话语言说者的期待。换言之,遵循基本的文化设定而完成中国话语的优化构建可以为取得目标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保障。^{[16](P4)}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海外理解当代中国的权威读本,其翻译程序严谨、译文质量高。^{[17](P4)}在第四卷英译本中,“社会革命”一词翻译为“social transformation”而非“social revolution”,正是鉴

于英语文化系统中“transformation”是与温和变化相关,如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安全感等,可以有效地引发英语受众的文化认同与心理共情,提升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因此,文化有效性可视作以中国话语准确研判“时代之问”的实践参照。可见,中国话语建构是准确回应“时代之问”的“扬声器”,文化语用理念可以引导中国话语建构,文化有效性则是中国话语建构的语用实践逻辑。

立足于开放性视角,时代之问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而提出的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12]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具言之,在“新时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建构新时代中国话语的思想灵魂”^{[18](P10)}。因此,只有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全面、精准地把握时代之势,并勇于站在人类发展的前沿,勇于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引导新的时代,并将理论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新时代中国大地上更具话语说服力,通过中国话语的建构与实践科学解答“时代之问”,在持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奋力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由此足见,充分把握文化有效性不仅可以建构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国话语,还能将文化自信转化为时代自信,恰逢其时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新辉煌提供契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方向指引。这也有力佐证了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是坚定理论自信、养成理论自觉的必要前提,也是回应时代关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的必然要求,语用实践逻辑也将指引中国成为国

际话语中的强者。

三、从话里到话外：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路径

文化语用学以文化语境的话语使用过程为基础，旨在“对话语信息进行恰如其分地表达和理解”^{[19](P10)}。这不仅涉及话语内部的字面意义，也涉及话语外部的的情感意义。这一文化语用理论框架可以充分描述、分析与阐释中华文化信息所包含的建构中国话语的文化语用资源。就中国话语建构目标而言，只有充分掌握中国话语在中华文化中的对应用语信息，中国话语才能真正做到“以言行事”，最终做到“以言成事”，在国际社会发出有分量的中国声音。进言之，从语言使用层面出发，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路径可归结为三种：文化指示、文化预设与文化言语行为。三种文化语用表达均需中国话语能够准确定位和充分掌握中华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敏感信息和特征。此间，还需激活和提取有效文化信息，选取话语的文化支点、预期层级和价值取向，并呈现说话者所持文化立场的姿态、言语行为或语用策略。^{[19](P10)}有鉴于此，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下，针对不同受众的讲话内容作为具体案例，分析建构中国话语具备可行性的文化语用路径。

(一)从能指到所指：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指示路径

文化指示是“话语激活文化联想、指向文化语境的方式”^{[19](P11)}，文化指示语经过文化投射，不仅可以实现文化信息传递，还能体现说话者的文化价值取向与立场，进而指明话语蕴含的文化用意，并在人际交往中实现其价值。从文化指示方式来看，主要包含“显性、直接的指向和隐性、间接、隐含的示意”两种方式。^{[20](P179)}中国话语建构可视作中华文化介入现实活动语境的一种文化语用表达。具体来看，显性的直接指向和隐性的间接示意这两种指示方式成为文化指示适应性调整的有力抓手，为中国话语建

构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建构以文化内涵为直接指向的中国话语。一般而言，构成直接指向的话语通常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有适切的文化事项可以关联；有适切的表达方式可以使用；被指向的文化事项对话语的信息表达有所帮助。^{[20](P179)}可见，从话语中找到激活文化事项的成分，并将话语的文化关联性以显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表明话语的意义留存于话语表面，具有极高的可行性。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彰显中华文化自信，可以针对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关照世界人民为出发点，从中华文化中寻找适切的解决方案，使中国话语具备指向问题本质的文化内涵，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提到，“‘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21]习近平总书记借用《管子·治国》的经典表述“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与文化事项相关联，巧妙地将文化事项中包含的文化成分——“和合理念”激活，直接指出国际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一贯主张。虽然以上用典属于形式层面的表层文化信息，但也从侧面投射出深层文化信息——中华文化固有的爱好和平、天下情怀以及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主张。

第二，建构以文化隐喻为间接示意的中国话语。一般情况下，文化信息隐藏起来的部分远超其显露的部分。间接暗示的话语“不仅承载着文化信息，也能够激活相关文化语境联想，为话语提供深层文化解释”^{[22](P103)}。文化隐喻作为典型的间接暗示手段，可以将即刻情境特征映射到文化事项之中，不仅可以呈现话语背后的隐性文化信息，还能够折射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反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彰显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建构以文化隐喻为间接示意的中国话语，关键在于寻找世界各国在文化维度的文化认知共识，将抽象化的共识认知转化为具体化的文化话语，在此基础上将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向国际传播。例如，2017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提到,“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同9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将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23]“朋友圈”作为社交术语,是自媒体连接群友的一种虚拟语境,既反映了中国人素有广交朋友的文化取向,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间接映射出他对文化语境变化的敏锐把握,这对于强化中国话语的文化推动力和全球影响力大有裨益。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强调,“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21]这一论述使用了一个形象化、共识化的隐喻“命运与共的大船”,充分强调和佐证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可以视作中国在国际社会积极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生动解读,也间接映射出自古以来中华文化追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二)从显化到隐化: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预设路径

预设是指“话语的语境基础和出发点,是说话人相信的、为听说双方共享的那些语境信息的背景化处理”。^{[19](P10)}进而言之,作为话语的文化基础,文化预设并非话语意向信息的构成要素,却彰显话语表征的文化合理性。中国话语建构可以将形式多样的文化预设(包括对事实、信念、状态和行为等方面在内的预设)内嵌于话语表达,充分激活中华文化张力,借助话语表达将中华文化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在国际社会,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引领效应。

第一,建构以文化议题为基础的中国话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丰富的话语资源。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形势下,文化议题的设置是中国话语建构必不可少的环节。要针对当前国际语境的动态特征,积极挖掘富有典型性、时代性、针对性与引领性的文化议题,寻求与国际

社会产生共鸣的交汇点,并促成文化概念命题的生成与推广,为解决当今世界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提到,“‘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甘蔗同穴生,香茅成丛长’。共赢合作是亚洲发展的必由之路”。^[21]其中使用的话语预设以与合作共赢主体相关的中华文化谚语为切入点,将中国主张巧借中华文化之力形成文化语用表达话语表征,为接下来积极倡导亚洲共赢合作迈出新步伐的倡议做好了铺垫。既能体现古代中国的文化自为高度,也能助力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的推广。

第二,建构以文化经验为依据的中国话语。中华文化经验是在历史与实践的事实当中凝练出来的思想瑰宝,是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凝练的宝贵经验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方法论维度的现实指导。建构以文化经验为依据的话语关键在于以文化事实为基础,通过凝练文化事实作为经验来预设当前国际问题的情形状态与未来走向,进而说服听话人并获其认同。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引用“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这些古语,^[24]在更大范围体现了其所具有的文化真理性和现实性价值。又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提到,“‘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其中提到的“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出自《群书治要·昌言》,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之中面对艰难险境表现出的决心与胆识。身处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中,中国以自身饱含文化经验的特色话语进行文化预设,满含善意与诚意地鼓励世界各国坚定信念、迎接挑战,为世界人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彰显中华文化的智慧与担当。

第三,建构以文化精神为支撑的中国话语。中华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绵延赓续的气节与风骨,也是中华民族久立于世界之林的意志与力量。中华民族在五千余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爱

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为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思想交流与话语沟通的精神养料。针对国际问题、世界诉求，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把中华文化的价值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推动以文化精神为支撑的中国话语建构符合世界人民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心愿。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讲到，“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大计，具有特殊意义”。^[24]其中，引用孔子的原话来体现中国人对待远方来客的热情文化态度，这种态度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具有厚重的文化价值。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提到，“亚洲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精神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话语作为中国在外交史上的独创术语，不仅对亚洲各国的发展愿景做出预设，也将文化精神力量转化为中国话语力量，为世界各国提供卓具成效的发展思路。

（三）从行事到成事：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行为路径

文化行为是一种情境化言语行为，不仅受到文化设定的约束，也承担具体的文化语用功能。^{[25] (P16)}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需要通过文化行为进行行事施效。更进一步，完成文化行为的行事施效需要精准解读隐藏在文化背后的文化意识，这也是中国话语建构的着眼点所在。中国话语建构需着重突出中华文化意识影响下的文化行为实施。以文化行为解读中国道路，用中国话语彰显中国气派，用中国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影响下的现实指向，也为中国话语建构提供行动指南。

建构以文化意识为核心的中国话语。作为

一种文化语用策略，以文化意识为核心的话语受到文化理念、价值、态度的影响，体现文化精神内核。具体而言，说话人传递话语信息的过程就是以言行事的过程，这个过程旨在让听话人理解话语中包含的文化行为指令，并明确自身应承担的文化责任。实现这一目标也就达到了以言成事的话语效果。可见，说话者达成的目标是建立在其文化话语的共情表达与收获认同的基础上，文化意识贯穿于行为施效的始终，指引文化行为的实施。因此，中国话语建构应始终坚持中华文化自觉，牢牢把握中华文化意识在话语表达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大力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深层文化信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兼之以德的文化行为去契合受众群体文化意识深处的文化理性设定，进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与认同。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20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20国集团要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26]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语，统领整个话语的走向，对G20成员发出号召，并动员大家合作共赢，这里的话语完全满足了全球化对文化的需要（理念、思维、行为与交往方式）。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强调，“‘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只要我们携手同心、行而不辍，就一定能汇聚起合作共赢的伟力”。^[21]引用中国古谚作为结束语，这本身便是以中华文化意识为核心的文化行为施效的典型例证，不仅引领了本次论坛愿景规划的整体走向，还能积极倡导与会各国积极谋求合作共赢。上述讲话事实上已经上升到国际交往的文化层面，话语所处的现实语境也上升为文化语境——责任、未来与文化相关联的语境，从而彰显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引领力。

四、结语

大国复兴往往伴随着话语的崛起。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也是中国话

语崛起的世纪。面对当前国际话语场域内的激烈交锋以及文化软实力的白热化竞争,亟待建构中国话语来阐释中国实践、凝练中国理论、表达中国经验,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目前值得国内学界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鉴于中外话语体系差异,文化语用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世界文化场域下的文化异同,摆脱在国际舞台面临的“话语贫困”处境,切实保证中国话语建构的实践性、有效性与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7](P212)}为此,文化语用视角的介入可以精准对接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对象,并以文化合理性、文化合适性与文化有效性来厘清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逻辑,最终以文化指示、文化预设与文化行为为路径促成中国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实践。

总体而言,中国话语建构要立足于语言文化维度,结合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接历时语境下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信息,推动中国话语的转型升级。同时,不断探索和优化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内容、样态与渠道,提升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当中的广度、深度和精度,持续凸显中华文化的意义。当然,基于文化语用视角推动建构中国话语,必将实现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走出去”向“融进去”转向,也必将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新篇章,完成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我们相信,通过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与质疑,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文化共存与文明互鉴研究的视角。本文权作引玉之砖,希望引起学界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背景下对于文化语用学的关注,以便更好地完成中国话语的建构与传播。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解传姣. 让世界读懂新时代中国: 理念与路径[J]. 对外传播, 2021(10): 36-39.
- [3]何刚. 文化语用学理论与实践[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4): 1-2.
- [4]竹旭峰, 何刚. 文化语用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相互关系[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539-544.
- [5]王付昌, 郭文亮. 中国近现代发展史论[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 [6]李康平. 中国革命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7): 122-127.
-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陈明琨, 陶文昭. 文化自信视阈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6): 96-106.
- [9]杨生平. 文化自信的意义及其实现[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6(6): 5-11.
- [10]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11]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践行嘱托十年间)[N]. 人民日报, 2022-03-06(1).
- [12]谈中国的制度自信与话语自信——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J]. 思想教育研究, 2013(3): 8-12.
- [13]唐爱军.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J]. 学习月刊, 2022(5): 10-11.
- [14]何刚. 话语、社交、文化——文化驱动的社会语用视角[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3): 35-41.
- [15]朱贻庭. “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新探[J]. 探索与争鸣, 2015(1): 68-72.
- [16]毛延生, 孙晨. 国际传播的文化语用实践: 逻辑、路径与自觉[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1-10.
- [17]张涓, 吴志雄. 中国政治话语核心概念英译修订的情感语义分析及国际传播启示——基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核心概念“社会革命”的考察[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5(3): 1-14.
- [18]徐稳, 葛世林. 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逻辑进路

- [J]. 学术交流2023(2): 5-13.
- [19]何刚. 全球领导力话语建构的文化语用路径: 以习近平讲话为范本[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3): 5-15.
- [20]何刚. 文化指示方式的解释——以当代美国英语话语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6): 174-184.
- [21]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22-04-22(2).
- [22]赵文. 指示语的文化语用视角[J]. 文化学刊, 2015(8): 103-105.
- [23]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7-01-20(2).
- [24]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18-04-11(1).
- [25]何刚. 论言语文化行为[J]. 修辞学习, 2007(6): 16-20.
- [26]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6-11(2).
- [2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责任编辑 刘婉华】

Cultural Pragmatics Practice in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bjects, Logic and Path

TIAN Ye & MAO Yansheng

Abstract: The cultural pragmatic practice of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s a necessary measure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pread the Chinese voice. First of all, as for the cultural pragmatic objects of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Chinese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which helps Chinese discourse to have both the era value of “culture inside” and “culture outside” to articulate the cultural genes and cultural streng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Chinese discourse.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ragmatic logic of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shap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hinese discourse with cultural rationality, cultural appropriateness and cultural validity will help exp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China, the world, the people and the times,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discours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ursive arena, thereby demonstrating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Finally, as far as the cultural pragmatics path of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s concerned, the cultural deixis,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and cultural behavior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in words” and “out of words,” ultimately achieving “accomplishing outcomes through discourse,” effectively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nd communicating Chinese voice, thereby projecting a weighty and influential pres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hor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ultural pragmatic perspective in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will not only help to transform China’s theoretical advantages,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discourse advantag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and show a credible, lovable and re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but also help strengthen China’s discursive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ering a resilient and substantive discursive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cultural pragmatics; cultural narrative; Chinese discourse; objects; logic; path